

## 重评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征引史料问题

范静静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是国内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综合性论著中的佳作，赞誉甚多，实至名归。但是，在其征引史料来源的合理性与运用的适应性上存在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新被重视的诗文类资料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作用于环境史领域。伊懋可的目标之一是简述环境发展的真实历史，借助传统的经史子集文献和国内既有成果，在具体环境问题的阐释上基本达成了这一设想。而由微观事件上升至宏观建构，仅靠解读诗文资料已显吃力，且存在以心理事实取代历史事实的偏差与误读，加之“过犹不及”的价值判断，令其不自觉地陷入线性恶化的环境衰退论的陷阱。这样的倾向不是个案，还明显体现在以马立博、易明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书写的中国环境史中，亟须得到纠正。文献适当是准确理解环境问题的基础，客观判读是获取合理解决方案的前提。规避已出现的弊病，转换各学科的史料资源，明确“环境”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中的位置，仍是目前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伊懋可；《大象的退却》；环境史；征引史料；历史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1-0132-14

### Re-evaluation on the Issue of Ci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by Mark Elvin

FAN Jing-jing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by Mark Elvin is one of the best comprehensive works on China environmental histor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However, there are great disputes o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sourc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adaptability of the us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mainly focusing on how to effectively apply the poetic and literary materials to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One of his goals was to briefly describe the real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which was basically achieve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pecific environmental issues with the help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domestic achievements. However, from micro events to macro construction, it is far from enough to rely onl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 and there is a bias and misreading of replacing historical truth with psychological truth, coupled with the value judgment of "too much is not good enough", which makes them fall into the trap of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recession unconsciously. This tendency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It is also evident in China environmental history written by western scholars such as Robert B. Marks and Elizabeth C. Economy, which urgently needs to be corrected. Proper historical materials is the basis of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is the premise of obtaining reasonable solutions. It is still the focu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to avoid the existing problems, transfer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define the position of

**【收稿日期】**2019-09-09

**【作者简介】**范静静(1993- )，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

"environment" in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Keywords:**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ical geography; ci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英国学者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原著于2004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十年后由梅雪芹等译成中文<sup>①</sup>,好评如潮,至今仍被中外学界奉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伊懋可本人也因之被冠以该领域的“先驱学者”和“顶级高手”之名<sup>②</sup>。

有关伊著征引史料问题颇具争议。该书甫出,包茂宏便注意到其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特点:引用并梳理大量中国古代诗歌、传教士回忆录和多种语言成果资料。并意识到征引诗歌会予人一种后现代主义叙事的诗化错觉,故预先说明伊懋可的诗歌观以免产生误解:在承认使用诗歌的冒险性的前提下,力求证实诗歌作为环境史料的不可避免性、可靠性和客观性,与后现代历史思维保持清醒的距离<sup>③</sup>。之后,王利华在为中译本所作的序言中,特别申明伊著在史料发掘与解读上给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供的可贵启示:高度重视笔记杂谭和诗文中的环境信息<sup>④</sup>。以此,提取过往常被忽视的非正史材料,尤其是诗类,被视为环境史学中探索文献适用的新方向。然而,正如包茂宏事先摆明的立场,以诗证史难免会授人以柄。陈全黎就此质疑: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作为可信且价值最高的史料?显然,言下之意是伊懋可的书写方式已越过可以借诗为证的红线,陷入证据不足和过度阐释的两难。而且,与包茂宏的意见相反,陈全黎恰恰认为伊著呈现出后现代史学写作的诗化倾向,无论如何力求客观,文学作品都只能提供史学所需的模糊证据,难做刻舟求剑式的精确考证。因此,文学证据的可信价值只适用于观念史、心态史及记忆史的范围。换句话说,用来解释环境观念与心态没有问题,但用来分析具体的经济或社会事件则不可取<sup>⑤</sup>。另外,米善军也指出伊懋可在引用史料时存有史实错误或牵强附会

①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梅雪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下文简称“《大象的退却》”或“伊著”。

② 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译本序言),第19页。另据既有研究,伊著原版面世的同年,包茂宏即赞誉其“是一部谁也绕不开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经典著作”(包茂宏:《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李聿恒虽称伊著“不算是非常新颖的著作”,在书评中也对其某些看法做出批评与补充,但仍认为瑕不掩瑜,该书“确实是理解中国历史上人与环境互动模式的力作”(李聿恒:《对伊懋可著作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的浅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可与伊懋可并称为中国环境史研究双璧的美国学者马立博(Robert B. Marks)称赞伊懋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和一个令人惊叹的历史学家”,“在中国历史和中国环境史方面的影响是巨大的”,并坦承自己“受益于他和他的学识”,“特别欣赏在他的著作和文章的引用内容中包含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原始资料。这些原始资料让我们倾听到了来自不同时代和地方的人的声音”(张程娟、张权:《环境史的研究及反思——马立博(Robert B. Marks)教授学术访谈录》,《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除此之外,译者梅雪芹及其他学人如张琪等皆不同程度地表达过对伊著的欣赏(张琪、包智明:《中国环境史研究及其对当代的学术启示——对〈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的比较分析和延伸思考》,《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整体来看,褒扬着眼于伊著的研究资料、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研究影响四个方面。

③ 包茂宏:《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④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译本序言),第10-12页。

⑤ 陈全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的解读<sup>①</sup>。综合两方态度,讨论的交结和目的是:新近被利用起来的诗文类资料如何才能更合理地作用于环境史研究。

带有文学性质史料的抬头是环境史研究步步深入的必经阶段,“不仅因为环境史是一门新学,还因为传统史学的先天缺失”<sup>②</sup>,加之史学认识的后现代转向,许多被边缘化的尘封旧史重新进入研究者的新视域。如何筛选以作事实判断不仅仅是获得结论即为终点这样简单,更是衡量隐藏在书写者背后的价值取向与逻辑方式的一把度尺。面对这一“环境史研究的新问题”<sup>③</sup>,伊著作为案例分析的典型性一目了然。

## 一、确定性与适用性:征引史料来源分析

《大象的退却》开篇即言“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简述真实的记录,尽可能是目前所知的真实的记录”。所谓“真实”的记录,必得“可信”的史料为支撑。对此,伊懋可的态度是严谨的:“首先是想说明这里所述的历史和我的分析依赖的是什么样的证据”<sup>④</sup>。

检索全书,伊著引用原始史料的来源主要是传世的经史子集:经部如《诗经》《孟子》《礼记》《周礼》《春秋左传》等;史部如《国语》《史记》《三国志》《宋书》《金史》《明史纪事本末》等,另有《贵州通志》《海宁县志》《杭州府志》《遵化通志》等地方志类,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輿纪要》等地理类和《大清世祖章皇帝圣训》《大清太宗文皇帝圣训》等诏令类;子部如《庄子》《管子》《淮南子》《列子》等,另有《潜夫论》《新语》《五杂俎》等;集部如《楚辞》《柳宗元集》《杜少陵集》《苏东坡集》《清诗铎》《山居赋》等。

除一手史料外,中国既有研究中涉及环境问题的论著也被纳入伊懋可征引文献的范围内。尤其是前四章对环境史的概述,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成果整合而成。论文类如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1965年)、林鸿荣《四川古代森林的变迁》《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续)》(1985年)、张钧成《商殷林考》(1985年)等,著作类如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1984年)、袁清林《中国环境保护史话》(1989年)、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1995年)等。经检,国内学者引用原始史料的来源与伊著大体一致:经部如《诗经》《尚书》《孟子》《周礼》《礼记》《论语》《左传》等;史部如《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十国春秋》《华阳国志》《史记》《汉书》《晋书》《宋书》《魏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明史》《明实录》等,另有《舆地纪胜》《三辅黄图》《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异域录》等地理类;子部如《管子》《墨子》《韩非子》,另有《吕氏春秋》《盐铁论》《白虎通》等;集部如《楚辞》《柳宗元集》《山居赋》《蜀都赋》《子虚赋》等。

再以伊著征引史料的时段特点来看,以唐代为分界点,之前主要以经部为主,辅以史部、子部和集部文献,争议在《诗经》《孟子》《庄子》等史料中的文学性或寓言性部分,之后则主要以史部和集部为主,辅以经部和子部文献,争议在《柳宗元集》《山居赋》《清诗铎》等文学作品聚集的集部。因用来论证唐代以后的环境问题所运用的史料种类丰富,纵然涉及不少文人笔记和诗文集,但有正史、实录、地理及地方志等历史类文献作骨干支撑,反倒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本起辅助作用的文学类资料的说服力。对比之下,主辅倒置,唐代以前选用文学类资料的做法,因在客观上缺乏历史类文献的旁证,颇受孤证难立、文难证史的批判。

① 米善军:《环境变迁视角下的中国历史——〈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品评》,《昆明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②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译本序言),第11页。

③ 陈全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④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序言),第1、13页。

既然伊懋可参考的国内论著在征引原始史料的来源上与其一致,那相关研究是否存在与伊著同样的问题?这一点有具体澄清的必要。分篇来看,首先,伊著引陈桥驿的文章,一是证明森林滥伐的根源要追溯到古代,二是佐证谢灵运《山居赋》所言不虚,进而肯定此诗价值<sup>①</sup>。对第一点,所用史料的内容同为“南宋疏浚鉴湖时,发现湖底有许多成湖前的汉代古棺”,陈文的解释侧重说明汉代此地不乏高大古木,虽与伊著有别,但在后文也指出汉代此地天然森林被破坏的速度加快<sup>②</sup>。所以,伊著除有几许夸大外,称不上是断章取义。其次,引林鸿荣的文章,为证古代以四川为中心的西部地区因造纸、棺木、日用柴等导致森林资源锐减<sup>③</sup>。较显著的区别在,如针对战国墓葬消耗木材一例,林文采取的方式是就事论事,借此揭示巴蜀时期的木椁墓习俗对当地各林资源已有相当程度的损耗<sup>④</sup>。而伊著则将之概括为“挥霍”,相比于林文的用词,主观能动性更强烈,贬义色彩也更浓厚。最后,引张钧成的文章,旁证周朝对森林的态度要比前朝更积极进取的猜测<sup>⑤</sup>。张文意借甲骨文的“农”字说明“农业对森林的影响”<sup>⑥</sup>。与前二者不同,由“难以捉摸”“似乎”等词可见,相比于张文论断的确凿,反倒是伊懋可变得谨慎起来。

从征引著作的角度,首先,伊著引许进雄的著作,一是以捕猎动物的种类与功用,说明森林的第四个功能是保护动植物的栖息地及为诸多原料提供来源,二是以绿松石和海贝的发现与传播,辅证交换和贸易与原始权力产生的关系<sup>⑦</sup>。引用处与许著本意无差<sup>⑧</sup>。其次,引袁清林的著作,一是借黄河决堤频率,论证森林的第一个功能是减轻风蚀和水蚀对表土的侵害,二是借1851年位于湖南南部的保山寨所存碑刻资料,揭露在迈入现代之时的偏僻地区也出现了要面对森林资源压力的征兆<sup>⑨</sup>。引用处也与袁著本意无二<sup>⑩</sup>。其三,引宋镇豪的著作,一是从商人与象的关系上,分析人类与象的搏斗过程,二是从夏商自然崇拜的对象上,表明古典中国的核心文化并不依恋森林,三是从卜筮的普及性上,揭示其与战争的关联,四是从集体组织特征、从军人口比例、牛车等运输工具上,申明其与权力出现的联系<sup>⑪</sup>。引用处与宋

①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22、349-350页。比如:“两千年前,在中国的中东部,为制作一口棺材砍倒整棵树的现象仍属司空见惯”;“研究过当地森林史的地理学家陈桥驿认为,在所能辨认的地方,谢氏所罗列的当地树木和哺乳动物的种类大体上是与之相称的。”

② 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65年第2期。

③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65-70页。比如:“新近挖出的一个战国时代的墓葬使用了大约100立方米的楠木,其中一些是9米多长的横梁。”另,伊著第65页第3条页下注,存在引文页码注释错误,将“第163页”误作“第63页”。

④ 林鸿荣:《四川古代森林的变迁》,《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林鸿荣:《历史时期四川森林的变迁》,《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⑤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50页。比如:“大概最令人遐想的一条线索是,商代甲骨文中‘农’的象形字似乎表明了在林间开展的活动。”

⑥ 张钧成:《商殷林考》,《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⑦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35-36、103-104页。比如:“在早期农夫的世界里,森林环绕,鹿可能妨碍谷物生长,老虎则被看作益畜,原因在于它们能减少鹿的数目”;海贝贝壳“随后用作中国的原始货币。”

⑧ 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6-51、463-466页。

⑨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28-29、62页。比如:“黄河堤坝大决口的频率降至每50年一次或更少”;“在随后的五代时期,这一数字上升至每3.6年一次”;“老人们创造了一种保护树木免遭过度采伐的制度。他们在碑刻上留下了这一记录。”

⑩ 袁清林:《中国环境保护史话》,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0、72、90-91、267页。

⑪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16、52、98、101-102、104页。比如:“商代,大象在东北部可能已得到驯养,当然,这方面的证据不足”;“周代之前有众多献祭于自然现象的仪式,但却没有针对森林的”;“在东部沿海,占卜技巧极其精妙”;“既然商初人口估计大约在400到450万之间,如此规模的调动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著亦相符合<sup>①</sup>。最后,引文焕然的著作,所占内容的比例甚大,页下注高达近三十条,集中于第二、三章。对此,伊懋可自己也声明并表达了谢意<sup>②</sup>。涉及观点有二:一是第二章据大象分布领域、退却路线等以证大象与人类的搏斗冲突过程,二是第三章据森林再生、物种特性等以证森林具备维护供水的稳定和质量、影响小气候,以及前面提到的保护动植物栖息地及为诸多原料提供来源三大功能<sup>③</sup>。针对唐代诗僧齐己作诗送别朋友一例,伊著与文著的解读正相反,后者认为诗中所言属实,但前者认为诗中内容只是作者的想象。据文焕然又举《太平寰宇记》中的相关证据,当是伊懋可判断有误。这也成为伊著征引诗证史的误用例子之一。至于其他所引处,基本合乎文著<sup>④</sup>。

由此,伊懋可参考的国内论著在谈到相关问题时,基本不存在不合理之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征引文人笔记或诗文资料时,往往再选用正史、地方志、地理类等史部和杂家类、别集类等子、集部的其他文献进行补充,避免孤证的同时,也避免了单采文学性史料带来的争议。如林鸿荣引《三都赋》,辅以《华阳国志》《汉书》《后汉书》及出土的汉墓画像等;张钧成引《诗经》,辅以《尚书》《史记》《管子》及甲骨卜辞等;宋镇豪引《楚辞》,辅以《五经通义》《淮南子》《竹书纪年》等;文焕然引唐代僧人诗作,辅以《岭表录异》《渑水燕谈录》《宋史》等。更重要的另一方面,上引诸著纵然含有环境史的内容,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论作,分属历史地理或农业考古等,要么谈动植物变迁,要么谈生活史变迁,特定概念、独立成学的“环境”只是作为背景而非书写主体,且研究的问题多是具体细微的,如大象在东北部是否得到驯养、某朝代某地的资源变化状况、宗教信仰中是否存在森林崇拜等,与伊著的“环境”主导视野存在偏差。也正因此,在征引此类论著时,除有误解或夸大的地方外,几乎没有前述陈全黎等提出的弊病。

在澄清、排除非借鉴国内论著以致争议的外因后,伊著本身顺而成为问题焦点。能够确定,所征引的原始史料并非皆有异议,尤其是史部和子部,用以证明的问题多隶属于宏观概括之下的微观事件,几无差错。如史部:引《国语》,说明可能反映当时某地区正在萌生的“焚林而猎”意识及加以阻遏的企图<sup>⑤</sup>;引《史记》,从中看出其虽带有文学艺术上的夸饰色彩,但仍未受到前现代经济发展影响的上古富

①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07、236-237、244-246、400-402、459-497、515-522页。另参考书末附图。

② “特别感谢文榕生博士,他是已故的文焕然博士的儿子及其文稿的保管人;感谢重庆出版社慨然应允使用文焕然所著的《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中的资料,《大象的退却》第二章的地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此为基础绘制的。”载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许可声明),第2页。

③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10-17、23-24、30-39页。比如:“图2-1‘大象的退却’显示了大象向南部和西部撤退的漫长过程的阶段性,这以已故的文焕然的研究为基础绘制而成”;“有时禁止私人出售象牙——例如10世纪晚期在岭南就是如此,但他们照样在黑市中交易”;“唐代诗僧齐己为朋友去岭南践行时,曾浪漫地设想他所到之处皆是:蛮花藏孔雀,野石乱犀牛。这都是些关于性情相对温顺、基本上在夜间出没的草食动物的文学想象,也表明作者缺乏对野生动物的切身体验。”

④ 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226页。另据第29、48、81、119-120、168-181、188-198、220-228页。

⑤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35页。比如:“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罟罗,……以实庙庖,畜功用也。……兽长麋麋,……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4《鲁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8页。

饶环境的描述<sup>①</sup>；引《三国志》，说明水利规划与军队后勤之间的关系<sup>②</sup>；至于引《行水金鉴》《天下郡国利病书》《至元嘉禾志》《嘉兴府志》等，更与理论导向的关联甚少。再如子部：引《淮南子》，说明特定环境出产特定物种<sup>③</sup>；引《潜夫论》，说明人们对棺木选择的重视<sup>④</sup>；引《管子》，说明当时经济发展获得独自存在的动力<sup>⑤</sup>。即便引经部和集部，也并不是凡运用处皆有。如经部：引《春秋左传》，描写人们对大象的认知<sup>⑥</sup>；引《月令》，描写人类与森林的暧昧关系<sup>⑦</sup>；引《周礼》，预先说明其中所记或许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sup>⑧</sup>。再如集部：引《清诗铎》，描写某地对饥荒的恐慌态度<sup>⑨</sup>；引《苏东坡集》，描写水利系统维护的代价<sup>⑩</sup>；引《楚辞》，描写不同时期对自然的体验和反应方式<sup>⑪</sup>。可见，这些都是作为某种背景、具体事例或明显影响出现在总体环境史的论述中，不牵连反对意见较大的关键问题。

“伊懋可永远不会把他丰富的知识用轻松的方式表达出来”，麦克尼尔的幽默评论正适合作为伊著广泛征引各种史料的注脚<sup>⑫</sup>。综合上述，伊懋可开篇提出的“真实”记录的要求在具体问题的阐释中得到了较好呈现。但是，环境史学的目标并不停留于这一基础性工作的完成，一旦上升至非具体的宏观思辨，所引资料——尤其是联结整个中国环境史开端的先秦时段，甚至截止到专门环境文献较缺乏的唐代——还能否撑得起来自理论建构的压力？这都是目前环境史料与方法讨论的重点。

- ①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57页。比如：“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榧栢豫章，桂椒木兰，檨离朱杨，楂榲栲栗，橘柚芬芳。”载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63年，第3003-3004页。
- ②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122-123页。比如：“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灌，……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载陈寿：《三国志》卷28《王卞丘诸葛邓钟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775-776页。另，伊著中译本将“克”误作“可”。
- ③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13页。比如：“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脩形兑上，……其地宜稻，多兕象。”载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卷4《地形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352页。另，伊著将“地形训”误作“坠形训”。
- ④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59页。比如：“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此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载王符：《潜夫论笺校正》卷3《浮侈》，中华书局，1997年，第134页。
- ⑤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115-120页。比如：“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载黎翔凤撰：《管子校注》卷2《七法》，中华书局，2004年，第111-112页。
- ⑥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16页。比如：“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载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四年，中华书局，1995年，第1090页。
- ⑦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35页。比如：“田猎置罟、罗网、毕、翳，饒兽之药，毋出九门。”载杨天宇撰：《礼记译注》月令第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3页。
- ⑧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52页。比如：“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载杨天宇撰：《周礼译注》地官司徒第二《山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
- ⑨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9页。“巴蜀荆南急鼓鼙，东吴西浙成疮痍。往时民贫鬻儿女，今年儿女鬻无处。”载张应昌编：《清诗铎》邵长蘅作《榆树行》，中华书局，1984年，第444页。另，伊著中译本将“鼙”误作“声”，将“痍”误作“疣”。
- ⑩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159页。“潮自海门东来，……旦夕之间，又复失去，虽舟师渔人，不能知其深浅。”载苏轼：《苏东坡集》卷9，（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53页。
- ⑪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340-342页。比如：“入溱浦余儻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日蔽日兮，下幽晦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载洪兴祖撰：《楚辞补注》卷4《涉江》，中华书局，2006年，第130页。
- ⑫ 包茂宏：《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 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征引史料争议分析

如果“事实”可以与“客观”类比,那么,“价值”便能与“主观”挂钩。每个历史时期承载“事实”的载体——史料——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彼时整体或个体的“价值”理念,而时序靠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又往往以当时的价值判断去征引或解释彼时的证据,使得彼时既有史料的“再呈现”展示出一种特定突显与特定隐去之貌。那么,在这种后一“主观”对前一“主观”的重塑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和“因时而变”的改“观”之处,既是对现象进行合理诠释的关键,也最容易掉入误读的陷阱。

落脚至宏观论断,伊著征引史料的不适之处开始凸显,歧异集中在叙述周朝环境破坏时引《诗经》《庄子》和定位产生第一个环境观念时引《山居赋》。就第一个问题,陈全黎举《诗经》《庄子》中的文段,认为“伐檀”“伐木”“大树”与“斤斧”等皆属修辞手法,不能作为滥伐森林的直接证据,更无法证明周朝是“基于森林滥伐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文明”<sup>①</sup>。参考周振甫及陈鼓应等分别而作的解释,《伐檀》意在讽刺无功受禄者,《伐木》意在展现友朋宴饮之乐,《庄子》选段则意在说明事物不分大小皆可用。若仅凭“坎坎伐檀”“伐木丁丁”“不夭斤斧”等语词的字面义,便将带有比喻意味的砍树行为与滥伐森林,甚至与某一朝文明的基石挂钩,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以此,陈文的相关反驳无疑是正确的<sup>②</sup>。需要注意,伊著在第四章直接论说周朝文明与森林滥伐之间的关系时,并未取用《伐檀》与《伐木》,而是将此二篇置于第十章,用来论述蕴含在诗歌中的自然观,也并未涉及太多的毁林场景。陈文以此为证,或许存在举例不当的现象。

再次回归伊著本身,类似的问题显而易见。《诗经》征引集中在第四章<sup>③</sup>,主要用来论证中原地区自有文献记载以来便大肆清理森林,借此管窥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的确,据引用篇章的内容,确实能看出当时砍伐森林以供建设的情状,自然可以说明伊懋可的部分论点没有实质性错误:“对其毁林的热情毫不隐晦”“农耕意味着清除森林”“费尽周折清除森林”“增强了一种印象,即树木通常不过是待烧的薪柴”<sup>④</sup>。而且,伊懋可对某些篇目也有清晰的认知:“有很多处提到过砍树作燃料的情形,其中大多数或许只是一种文学手法而已,即通过类比或暗喻来使文章增色。因此,不应将它们视为人们的普遍做法的必然反映——有时甚至恰恰相反,是一味地在追求修辞效果”<sup>⑤</sup>。虽然如此,但伊著仍然将作为“文学手法”且“非普遍做法”的行为具体化成“历史写实”的“普遍做法”,否则不会有上述“没有实质性错误的部分论点”。这样的应用是有合理限度的,不能全盘否定,可一旦越过具象表达的红线,“普遍做法”继续

①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48页。

② 陈全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336-338页。《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载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第142、221页。《庄子》内篇《逍遥游》:“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载陈鼓应译注:《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12年,第35页。

③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48-54页。《诗经·大雅·皇矣》:“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柞械斯拔,松柏斯兑。”《诗经·周颂·载芣》:“载芣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经·大雅·绵》:“柞械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駟矣,维其喙矣。”《诗经·鲁颂·閟宫》:“徂徕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栢有舄,路寝孔硕。”《诗经·大雅·棫朴》:“芼芼棫朴,薪之樛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载周振甫译注:《诗经译注》,第383、485、376、505、377页。

④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48-54页。

⑤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53-54页。

深扩,直至上升到国家意识层面,如周朝是“基于森林滥伐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文明”,“自然资源的短缺已露端倪,而国家正在从中渔利”,古典中国“不致力于保护森林,当然就缺乏对它们的敬畏”等<sup>①</sup>,解释力度便会大打折扣。更何况,再去注意伊著的用词,会发现主观夸大的倾向严重:“森林滥伐(deforestation)”、“它这么做的时候,态度自觉(self-consciously),神情激昂(passionately)”、“毁林的热情(enthusiasm for destruction)”、“清除森林(removal of the forest)”、“环境清理政策(the policy of environmental clearances)”、“普遍做法(common practices)”<sup>②</sup>,无一不令人质疑该如何对待论从史出的客观性。

不仅限于《诗经》,其他同等性质的史料运用也存在相似的问题。最先引诗文以证环境破坏的地方出现在第三章。通过柳宗元《行路难》开篇,伊懋可承认“这首诗富有政治意味,其中提及的树木蹶倒,暗指朝廷才华之士的损失”,但仍用作论据说明“曾经覆盖中国广大地区的古老森林被毁了”。从内容上说,诗中句句直指森林破坏,伊著这样解释也属情理之中。且不论柳宗元作诗出于何意,必有当时砍伐森林的场景为铺垫。需要注意,这只限于柳宗元经历中的所见所闻,但依伊著用词,能否概括“覆盖中国广大地区的古老森林被毁(the destruction of the old-growth forests that once covered the greater part of China)”这一宏观论点恐怕还是要画上一个问号<sup>③</sup>。另有引苏轼《石炭》,说明“这位诗人已意识到森林滥伐的危险(dangers of deforestation),对前现代工业的燃料供应也产生了忧虑”。但是,按照诗前苏轼所作自序,“彭城旧无石炭,……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武器),犀利胜常”,又见苏轼《田国博见示石炭诗,有“铸剑斩佞臣”之句,次韵答之》中有“楚山铁碳皆奇物,知君欲斫奸邪窟”等语,与《石炭》最后一句“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正好呼应,可知苏轼想要表达的重点是石炭为制造武器提供了新的能源,并为之欢呼<sup>④</sup>。至于是否“意识到森林滥伐的危险”,又是否对“燃料供应也产生了忧虑”,只能说是伊懋可的个人推测,单凭这一首诗或许很难得到确证。像这样的例子,还有第一部分提到的引用林鸿荣的文章,说明“在公元前一千年中叶之后的某个时期,一旦铁斧可以使用,四川就开始挥霍木材(a prodigal user of wood)”<sup>⑤</sup>。“挥霍”一词多指没有节制的浪费,而对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四川居民来说,“挥霍”的用意估计难以成立。

由此,伊懋可对史料的“重塑”牵涉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离合,这是理解其征引史料是否适用的关键。上述例举中反映出来的论证方式明显带有这样一种取向:将诗文的真实意图与文字呈现进行二分,以论者欲意表达的心理事实(psychological truth)代替诗文本原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truth)<sup>⑥</sup>,借其表以证己实,颇有几分“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感。但凭此就可以认定伊著的论述是完全不合理的吗?不

①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48-52页。

②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48-54页;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Pp.42-47.

③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21页;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P.19.《行路难·其二》:“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伐与椽。深林土剪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崿豁空岩峦。”载柳宗元:《柳宗元集》卷43《古今诗》,中华书局,1979年,第1240-1241页。

④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23页;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P.21.《石炭》:“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肝。……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鍛。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载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8页。

⑤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65页。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P.59.

⑥ 指目的影响手段,致使例证运用中出现断章取义、勉强附和等现象。参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序),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1页;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 (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页。

论是否带有或具备何种寓意,诗文的字面中的确包含了破坏森林的行为,囿于彼时客观条件与主观认知的限制,并不见得诗文作者能够认识到这已经从属于现今意义上的环保范畴,而以倒叙的历史手法回看,将“身在此山”却不知“此山”的不自觉流露予以变换视角的“再发现”与“再解释”,不能不说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心理事实的反向建构。所以,伊著征引上述史料时出现的问题不在不适用,而在“过犹不及”,事实判断存在偏差,价值判断过于有意,两相合力下的宏观指向自然出现罅漏。

对于这一不足,除第一部分中有关具体问题的征引史料得当外,总体论述的文献运用也有兼顾自如的地方可供参考。比如征引《孟子》,伊懋可解说“这大概描写了公元前两千年末期黄河中下游的情况。我们不一定相信其中的细枝末节,但是可以将它作为对某种延绵不断的社会记忆的表达,所忆的则是一种反映了巩固农耕文化之努力的心态。”<sup>①</sup>陈全黎对此类“解释中国古典诗歌中透露的环境观念或心态”的做法表示称许<sup>②</sup>。上古史实已很难明晰,所谓“可信的”旁证史料也少有库存,引用以呈现某种“模糊的”事实,并采取观念史或心态史的方法给予阐释,与强硬考辨“确定的”事实相比,的确更具有说服力。此外,引《诗经》和《楚辞》解读大自然的启示<sup>③</sup>,引《五杂俎》探寻“科学”中的自然与环境认知<sup>④</sup>,引《清诗铎》说明清末森林破坏的阶段<sup>⑤</sup>。这些涉及自然思想的征引与阐释,皆在适用范围之内,可视为进一步研究的借鉴。

就第二个问题,即伊著在定位中国的第一个环境观念时对《山居赋》的运用是否合适。陈全黎持完全反对的意见:以“桃花源在哪里”的学术争论为例,认为伊著以坐实真实地点的历史考证解读《山居赋》陷入了证据不足和牵强附会的泥淖,故对此类作品提供的模糊证据,最好采用“模糊证明”的方法,得出“莫须有”的模糊结论,而不应以自然科学的名义作刻舟求剑式的精确考证<sup>⑥</sup>。

正如陈文所言,伊懋可的考订方法并非首创。在落实《山居赋》描述的地点位于北纬30度的杭州湾南岸一线山脉的边缘(今浙江上虞)这一争论上,伊懋可直言受到陈桥驿和韦斯布鲁克的启发<sup>⑦</sup>。对于前者,伊懋可认为陈文将树木和哺乳动物的种类与当地的物种匹配。其实,陈桥驿引《山居赋》,还借鉴了《吴越春秋》《越绝书》《会稽记》《舆地纪胜》等典籍中的记载,与诗文建立联系的是绍兴以南的丘陵地区(南林)<sup>⑧</sup>,而定位至其北部的杭州湾南岸则是伊懋可进一步探讨后的结论。但是,因二地相距不远,物种基本相同,将南林之物移植作北面之物的参考,也属合理。对于后者,接受其相信《山居赋》“是由真情实景直接触发而来的”看法,为自己落实具体地点的行为增加“可信的”筹码。就学界的相关研究,对《山居赋》地理位置的考辨也是讨论的重点,主要分为“嵊州嵎浦”与“上虞东山”二说,但至今未有定论<sup>⑨</sup>。显然,伊著的考察结果不过是站在“上虞东山”说一边,作为延续并推进既有成果的一种补充。

另外,化典籍中的“模糊”内容为“清晰”地点的文章,除陈文所举的“桃花源”之争,还有对《山海经》

①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12-13页。比如:“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载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6《滕文公章句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154-155页。

② 陈全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③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337-348页。

④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397-417页。

⑤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442-458页。

⑥ 陈全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⑦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349-350页。

⑧ 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65年第2期。

⑨ 晁元君:《谢灵运因任自然的地理空间思想》,东北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持“嵊州嵎浦”说者主要以金向银为代表,持“上虞东山”说者主要以盛鸿郎为代表。

地域范围的考证,可基本归纳为“华夏”说、“局部小区”说和“世界圈”说三类,其中的“局部小区”说是定位最精确的一种<sup>①</sup>,以何幼琦将《海经》视为对山东中南部的描述和扶永发将《山海经》与滇西地理的吻合为代表<sup>②</sup>。近年,又有刘宗迪论证《大荒经》反映的地区是山东半岛的北、东、南海岸一线及泰山以西地区,为学界新备一说<sup>③</sup>。

从“桃花源”到《山海经》再到《山居赋》,自陈寅恪至伊懋可,考索具体地点的路径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若说较明显的变化,因时代各异而采用现代化的手段或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倒可以作为其中一点,但凭借的切实依据仍然是从文献中来、再回到文献中去。对此,根本的疑问是:面对同样的史料内容,为什么能够证出不同的地点?究其底,如果说普遍意义上的“普遍史实”还能被达成一定共识,那问题便出在具体史实(特殊史实)的理解限度上,而后者的深挖又往往与争议甚多的古句义、古语音及古距离等琐碎的事实判断相连,一言不合便容易变成自说自话,从源头上生发出来的歧义自然极难消解。所以,才会有“过于坐实,反而失实”<sup>④</sup>的逆反结局。“以诗证史”的争论由来已久<sup>⑤</sup>,既不能简单地归于牵强附会,也不能绝对地一一对应,介于“模糊性”与“确定性”之间的诗中史成为“以诗证史”最巧妙,也是最受诟病的地方。回归伊著内容,其借此想要传递的是公元四世纪以谢灵运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自然观念,进一步阐发此种态度对日后环境发展的影响。能否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清晰的环境观念”有待商榷<sup>⑥</sup>,因为这已经从属于宏观意义上价值判断的范畴,但作为像考证“桃花源”或《山海经》具体位置的一种事实判断的尝试,“聊备一说”倒无所不可,毕竟这一方式本就带有不可证伪或难以证实的意味,大胆假设之余,若能自圆其说,也无碍于环境问题的主体讨论。

文献适当是准确书写中国环境史的基础。对诗文史料作出新解,拓宽研究可用资料的范围,伊著有指引方向之功。虽然在某些问题的事实判断上存在些许偏差,但对具体史实的理解并未出现大的错误。引起争议的本质不在史料适用与否,而是价值判断越过可被接受的红线。过度推论的结果纵然能将目光聚焦在长期被人忽略的地方,但风险与收益的概率等同,一旦涉及所谓的真实层面,令人耳目一新的程度便会等同于招致批评的力度。另外,老生常谈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仍应被再次强调:可以否认伊著的大观点,但不代表其下的小论断也有问题;可以不同意具体地点的考证,但不能否认这一延续下来的方式也有可取之处。由此,面对中国环境史这样一门新生学科,对每一次磕绊的及时省察是很有必要的。

### 三、中国环境史征引史料问题的再审视

据环境史的发展历程,约20世纪60、70年代肇始于美国,90年代前后被传入中国。在此之前,国内

① 参见张步天:《20世纪〈山海经〉地域范围的讨论》,《益阳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② 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扶永发:《从青丘国看〈山海经〉地理与滇西的吻合》,《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③ 刘宗迪:《四海之内:〈大荒经〉地域考》,《文史哲》2018年第6期。

④ 张耕华:《“以诗证史”与史事坐实的复杂性——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⑤ 参见高华平:《也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诗说诗”的治学方法——兼与万绳楠先生商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李洪岩:《关于“诗史互证”——钱钟书与陈寅恪比较研究之一》,《贵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陈建华:《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札记》,《复旦学报》2005年第6期;张耕华:《“以诗证史”与史事坐实的复杂性——以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周金标:《论杜诗“诗史”说与诗史互证》,《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第1期。

⑥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348页。

虽无“环境史”之名,却有与其实际领域颇多重合的历史地理学、物候学、农林学及水文学等学科基础。借助国外的新视角、新方法,中国环境史研究开始整合相关学术成果,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专业体系。但是,整体的、系统的环境史论著仍以国外研究为主,至少在伊著出版之前,国内“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综合研究论著又几近空白”<sup>①</sup>。那么,如何从环境史角度转换、利用既有史料,如何尽可能避免已有探索中出现的弊病,从而获得有益于本土的实践经验,仍是当下讨论的热点问题。

继伊著中译本出版后一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刊行的美国学者马立博所著《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一书,可视为值得与伊著并论的典型案列<sup>②</sup>。依照王利华的评价,二书的体例与风格并不相同:前者侧重专题开拓,提出问题、解读史料,后者注重整体汇通,遵循历史时间表,论述自然与社会的互动<sup>③</sup>。需要注意,在征引史料问题上,马立博却表现出与伊懋可相似的逻辑取向。

简要地说,马著对中国传统文献的征引程度远远不如伊著。经检,主要引用如经部《孟子》《春秋左传》《礼记》等,史部《史记》《汉书》《宋史》《明史》《资治通鉴》《广州通志》《安溪县志》《岭外代答》等,子部《管子》《庄子》等,集部《刘禹锡集》《嵩山文集》等<sup>④</sup>。关于国内涉及环境问题的论著,主要引用如姜戎《狼图腾》、文焕然等撰《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等历史概况》、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等初步研究》、宋镇豪《夏商人口初探》、张钧成《商殷林考》等<sup>⑤</sup>。与伊著对比可见,诗文类不是马立博关注的重点,即便采用集部史料,所证皆为具体问题,运用基本无误<sup>⑥</sup>。至于对经、史、子部及国内论著的引用,同集部的情况大致相似,因很少与某些总体论断直接关联,故舛误不多。比较明显且容易引发争议的一处是:征引《孟子》,说明“周最终战胜商并制服了自然,由此重建了秩序”<sup>⑦</sup>。在这里,马立博参考了伊著中的内容并表示赞同<sup>⑧</sup>。由此,与伊懋可迥异的一点,马立博所持观点中的不适当的地方,多是建立在征引西方论著而非分析中国文献的基础上得出。其实,如果思想逻辑是西式的,即便征引文献以中国为主,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毕竟观念的偏执是很难靠几份遗落的史料便可以轻易扭转的。

①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译本序言),第7-8页。

②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下文简称“《中国环境史》”或“马著”。Robert B. Marks: *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United Kingdo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2.

③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序),第2页。关于二书的比较,另参见张琪、包智明:《中国环境史研究及其对当代的学术启示——对〈大象的退却〉〈中国环境史〉的比较分析和延伸思考》,《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④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8、34、35、53、88、93、95、97、113、124、127、174、199、209、234、281页。

⑤ 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文焕然、何业恒:《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等历史概况》,《自然资源》1979年第2期;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张钧成:《商殷林考》,《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另征引如林鸿荣:《隋唐五代森林述略》,《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马忠良等编著:《中国森林的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年。征引上述诸书处,参见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5、23、27、50、63、78、100、112、160、192页。

⑥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157-158、199页。《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林红叶尽变,原黑草如烧。”《莫徭歌》:“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畲田作》:“何处好畲田?团团纒山腹。……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音。”载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5、239、246-247页。另,《嵩山文集》:“河水所淤之地,不生寸草而白碱是生。”

⑦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87-88页。“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载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6《滕文公章句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154-155页。

⑧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12页。

虽然征引方式殊途,但价值指向却是同归。注意马著的判断和用词:公元前5000年“清除部分森林(some forest clearing)”,公元前2000年“毁林开荒(forest clearance)”,公元前500年“华北平原森林砍伐(deforestation)”,公元元年“华北平原森林砍伐殆尽(plain deforested)”,“早在三千年以前,中国人已经对环境施予了显著的影响(hav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environment)”及“制服自然(subduing nature)”等<sup>①</sup>。另外,在美国学者易明撰写的《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一书中,将这样的偏颇呈现得更加简单粗暴:“破坏环境的传统”、“缺乏任何有约束力的环境保护意识”及“早在7世纪,中国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给环境敲响了警钟”等<sup>②</sup>。“我们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时间,这种清除森林开辟农田的行为达到了毁林的程度”<sup>③</sup>,马立博的这句话真正抓住了当下争议的一个重点,但是,作为一种解释,他与伊懋可、易明等西方学者给出的答案却是把时间推到公元前2000年以前。先不论这样的回答能否服众,就其共处于同样的预设下而言,他们的主要观点只能是大同小异,若后续不能从立论根源进行批判性反思,仍然继续出版同类型的著作,那便很有可能沦为“套路”的重复,影响力也必将大不如前。

从“砍伐”到“滥伐”,从“清林”到“毁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传递出来的效果则由中性转变为恶性,一切正常的人类活动被完全认定为是负面的、变态的。那么,再次回到马立博等已经做出回答的疑问上来,二者的临界点在哪里?一笔划到公元前2000年以前是否合适?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多将之附于环境衰退论的广泛探讨中,而蓝勇提出的“干涉限度差异”的理论建构可作为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主要代表。“干涉限度差异”命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个案研究,即在考虑环境天然敏感度和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时间差异下,存在“匠化”、“选择”和“重建”三种考量过程,对环境的干涉因区域地缘、海拔高程和作用方式的不同而产生异质影响,故环境破坏“临界点”的确定很难适用于一个太大的区域,更多的只适用于小空间“小生境”<sup>④</sup>。按此观点,宏观的整体临界让位于微观的局部临界,长时段临界让位于短时段临界,临界点的确定只能具体地域具体分析,是否定位在公元前2000年或其他某一个时间点则失去了参照意义。

不禁要问,既然可以就某一时段的某一地区深耕细作,若假以时日,为何不能就各个时段的总体地区做出概括?即便如蓝勇所说,确定一个“大格局”意义上的环境临界线需要综合考量地形地貌、气温湿度、人口规模及水源总量变化等因素,相比于“小格局”来说更为复杂。但是,难以操作不等于不能操作。仅就本文涉及到的陈桥驿、宋镇豪、林鸿荣、文焕然、张钧成及竺可桢等学者的文章来看,已涉及到对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人口总量、森林分布、气候变化及生物种类等方面的探究,在此基础上,针对环境史给出的疑点,重新审查其中的征引史料,按图索骥,继续发掘被忽略的类似史料,查漏补缺,以“个案—区域—整体”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或许会有新的发现。以秦汉为例,首先明确环境史研究的对象和目的,然后据此厘清所见文献中有关某时、某地的相关记载,再结合考古学、地理学等成果,利用大数据等智能手段,从一个具体地点扩展到一片区域再到更大的范围,或者将一个个具体地点逐次连缀成片,最后在获得某些确定的场景与结论的背景下,尽可能对其余地区的模糊情况做出多种可能性推测。以环境史的任务为中心,各取所需,初步完成对这一时期环境问题的局部与全景考察,这并不仅仅涉及基本的环境状况,还应关注于人与自然的互动、环境思想等多个维度。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至清,皆可依此而行。这样一来,在确定一个个局部临界点的基础上,根据各类环境资源与总体环境资源的比例差

①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14、64页。Robert B. Marks: China: It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United Kingdo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2, Pp.10,48,66.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用词的中文翻译并不准确,当以英文含义为准。

② 易明:《一江黑水:中国未来的环境挑战》,姜智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23页。

③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第72页。

④ 蓝勇:《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干涉限度差异”理论建构》,《人文杂志》2019年第4期。

值,大致可以得到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局部与全景环境波动变化图,分别重合对比,或许能看出最低值和最高值的相对位置,并由此判断相对临界点的时段。当然,这一设想是否可行取决于实践操作的完成度,且要呈现制图、数据分析、波动比率等,还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和技术能力,并非短期可以达成。以此,当下学界所侧重的区域环境史<sup>①</sup>,会成为日后整合研究的坚实基础。

伊懋可等将“滥伐”的临界点上溯至先秦时期,意味着“文明社会”的出现等于环境破坏的开始,文明愈发展而环境愈退步,呈线性恶化趋势。对此,学界几乎一边倒地持反对意见,以王利华、蓝勇、侯甬坚、刘向阳及赵九洲等为代表,概括这一看法为环境(生态)中心主义、环境衰退(衰败)论、环境破坏论、环境复古主义及文明原罪论等,认为其成因源自现代的环保主义运动,在尽量规避此类过激观点的同时,也要避免滑向另一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应摆脱定式思维和机械决定论,关注纷繁复杂的不同面向,理性认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修正生态环境优劣的标准,从生命关怀出发,重新审视人类与环境的位置<sup>②</sup>。需要警惕的是,鉴于中西意识形态的政治分殊,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某些叙述与评价“不能不令人猜想是受了‘中国衰败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套用西方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可能扭曲甚至颠倒事实真相”<sup>③</sup>。

环境衰退论的逻辑是单线退化,只关注结果而不关注原因、过程,甚至暗含全面否定发展的潜台词。照此,既然“农耕意味着清除森林”,清除森林意味着环境破坏,而“戎狄的生存方式对环境有利”<sup>④</sup>,那么,发展农耕从源头起就是一场“美丽的错误”吗?进一步说,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误会”吗?显然不能这样表述。若以政治发展史的角度,权力控制和国力增强代替环保成为衡量标准,以环境为中心的叙事架构就会摇身变成正面价值的铺路石。所以,面对同一史料含有的不同事实维度,选取何种标尺直接关乎叙述的天平会向何方倾斜,所谓客观性、合理性的得来,也便是这样一种上下摆动的取

① 参见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王子今:《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韩昭庆:《荒漠、水系、三角洲:中国环境史的区域研究》,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马立博:《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王玉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王利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王星光:《中国农史与环境史研究》,大象出版社,2012年;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三联书店,2013年;王建革:《江南环境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张全明:《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中华书局,2016年;张俊峰:《泉域社会:对明清山西环境史的一种解读》,商务印书馆,2018年。另参见李金玉:《周代生态环境的考古分析》,《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夏炎:《转凶为吉:环境史视野下的古代喜鹊形象再探讨》,《南开学报》2013年第4期;张强:《生态环境对西周历史进程影响研究》,郑州大学2014年博士学位论文;聂传平:《宋代环境史专题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陈彦风:《元代环境史专题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张权:《明清时期绍兴地区水环境变迁研究》,浙江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李正亭:《环境史视域下云南井盐生产与井场森林生态》,《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唐尚书:《汉唐间罗布泊地区的环境演变研究》,兰州大学2019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参见王利华:《中国生态学的思想框架和研究理路》,《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蓝勇:《对中国区域环境史的几点认识》,《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赵九洲:《论环境复古主义》,《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5期;赵九洲:《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认识误区与应对方法》,《学术研究》2011年第8期;侯甬坚:《“环境破坏论”的生态评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王利华:《探寻吾土吾民的生命足迹——浅谈中国环境史的“问题”与“主义”》,《历史教学》2015年第12期;刘向阳:《环境史叙事范型演变路径的追溯与反思》,《史林》2017年第2期;行龙:《环境史与社会史》,《社会史研究》2018年第1期。

③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序),第3页;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译者前言),第2页。

④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49、28页。

中过程而已。

虽然环境保护成为一种运动是现代的产物,但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保护环境措施和思想,即便是伊懋可等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森林的破坏与恢复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尤其在工业时代还未实现的农业社会,如果大型用木资源短缺,也会受制于供需价格的波动影响,不会毫无限制地开采,更不必说那些无人问津的深山老林,森林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缓慢生长。况且,如果按伊懋可、马立博等人的叙述:西周毁林、汉代华北森林砍伐殆尽、11世纪“中东部地区燃料木材即将告罄”等<sup>①</sup>,岂不是而今满目所见的该是一片光秃吗?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共生而是依赖,资源的索取不是双向而是单向,但这并不是说凡带有利用自然的行为皆为破坏,而是超出环境承受力的部分才是需要严格调控的地方。

“20世纪是环境破坏的世纪”<sup>②</sup>,被现实逼问而出的环境史研究从骨子里就带着极强的现实主义基调。当今中国的环境问题逐渐受到大家的重视,中国环境史研究随之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基础的史料征引,西方学者大胆试用文学类文献,在开辟新空间的同时,也出现强行解释和过度理解的误读现象,甚至陷入线性退化的极端环境主义的泥淖而不自知。

以此为鉴,就环境史写作中的史料难题,学界已对征引史料的特点与适用价值等方面进行了多次讨论,基本达成几点共识:一是继续文献学层面的史料甄别,查勘比对,防范有意或无意的偏差与错误;二是不立成见的广泛利用各类资料,“人弃我用”,以新视角解释旧史料;三是学习自然科学的专业优势,跨学科交流,“使有限材料的利用效率最大化”<sup>③</sup>。尤其注意最后一点,在诸如《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等论著中,详细解说了有关气候与物候等资料的分类与判读,为环境史料的恰当运用提供了良好的参考范例<sup>④</sup>。

有了先期的批判性认识,中国学者的环境史书写已尽可能避免了西方论著中出现的偏颇。比如,新近出版的《中国大通史》系列,对先秦森林砍伐的表述便已十分客观,如“即使在周代,……农田居邑之外,依然广布森林、草场”、“周代诸侯被封往各地,几乎都要经过斩除荒林、铲除草莱的过程”、“即使在最发达的农耕区,也只是山林草场与农田杂陈”等<sup>⑤</sup>,相较于伊著等为了展现环境破坏而断章取义的现象,明显前者才是更符合于当时环境概况的叙述。

另外,还有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一书,对经史子集类文献各有征引,以小见大,在具体与宏观问题的阐释上较好地践行了其对环境史料的应用要求与标准<sup>⑥</sup>。环境问题事关人类自身,在学术讨论的范畴之外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尤其是因环境、生存、发展三者互联而引发的冲突被日渐激化的当下,更应合理看待环境问题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位置。

①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第22页。

② 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序),韩立新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页。

③ 钞晓鸿:《文献与环境史研究》,《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王利华:《生态史的事实发掘与事实判断》,《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濮德培:《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韩昭庆译,三联书店,2018年。另可参见吴寰:《中国环境史文献的分类问题初探》,《保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聂选华:《中国环境文献特点探析》,《保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王彤:《先秦文献中环境史史料价值探析》,《保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李明奎:《近四十年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的回顾与思考》,《鄱阳湖学刊》2017年第4期。

④ 邹逸麟等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27页。

⑤ 沈长云主编:《中国大通史》第2册《夏商西周》,学苑出版社,2018年,第159-160页。

⑥ 王利华:《人竹共生的环境与文明》,三联书店,2013年。